

山东省
淄博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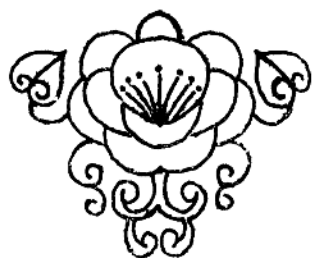
文化志资料 汇编



山东省淄博市文化志编纂组

山 东 省 淄 博 市

文化志资料 汇编



(上卷)

淄博市文化志编纂组



毛泽东、朱德同志接见我市《红嫂》一剧演员。
一九六四年于北京



周恩来同志与淄博市京剧团演员合影。
一九六四年于北京



1959年梅兰芳先生与王成旺同志
合影。
(市文化局供稿)



1962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
生在莅鲁收徒典礼仪式上。

我市京剧团演员周砚铭、周婉华拜师。

地点：济南，省交际处

(市文化局供稿)



1961年淄博市党政领导人与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同志合影。

(市文化局供稿)

说 明

文化志是《淄博市志》的一个分志。由市文化局、市广播局、市出版局、淄博日报社、市文联联合编纂。

本资料汇编拟分卷编印。此为上卷。

资料由查档、采访、剪辑、摘抄、征集、拍照而获。经各承编单位选编，统一审定后付印。

翔实的资料是编纂志书的基础。本卷所收史料，大都经过了慎重地调查和核实。时间上限自一八四〇年，下限至一九八一年。齐国的灿烂文化也是本志的重点之一。

由于年代久远，当事者记忆有限，再加上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所限，故其中遗漏、误错之处难以避免。我们欢迎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市文化志编纂组

淄博市文化志资料汇编目录

(上卷)

淄博市文化志领导小组及编纂工作人员名单·····	(1)
文化志——文化局编纂组顾问名单·····	(1)

古代文化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张福信 (2)
齐国音乐活动考·····	秦吟 (12)
孙廷铨和他的《琴谱指法省文》·····	蔡淑海 信惠忠 (21)
屈原三次至临淄·····	张福信 (23)

新闻广播与出版

淄博日报·····	张广哲 (24)
淄博日报社组织机构变化·····	(26)
回忆《建设报》片断·····	宋文范 (27)
回忆《淄博工人报》创刊初期·····	谭连 (30)
美好的回忆·····	寒枫 (31)
回忆《职工生活报》·····	国春城 方晓 (33)
淄博市广播事业局组织机构·····	郭兰香 (35)
淄博市张店转播台发展简史·····	姬长福 耿衍水 (37)
淄博出版局(社)组织机构沿革·····	崔章荫 (40)
淄博地区出版发行历史简述·····	崔章荫 (42)
回忆在淄博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片断)·····	宋日亭 (46)
回忆新华书店张店支店的创建(片断)·····	牛占录 (47)
博山书店创办杂忆·····	赵丙南 (49)
回忆解放战争中渤海区周村书店兼随军发行工作概况·····	张新 (51)
三世印刷 四易其名·····	蔺百杆 (54)
淄博市作者创作的鲁版书画一览表·····	(56)
渤海新华书店一九四八年一至五月自编、翻印图书统计表·····	(58)
渤海新华书店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出版发行统计·····	(59)
关于《淄流》的创办情况·····	罗光州 (64)

文学艺术

淄博市文化局的设立与沿革·····	(65)
淄博市文联机构的设立与健全·····	罗光州 (66)

淄博市戏剧曲艺等四个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理事名单	(68)
淄博市五音剧团简史	董文林 (69)
试析五音戏主要板腔的基本规律及其特点	信惠忠 (78)
一嘟噜一穗 喜得人掉泪	信惠忠 (88)
五音戏音乐发展概况	王根生 (95)
梨园往事录	邢洪山口述 肖玉 信心整理 (111)
五音戏老艺人简介	董文林整理 (119)
五音戏的衍变分期与艺人接代关系表	崇刚 惠忠整理 (129)
原市吕剧团改组、入恢复建制后的淄博市五音剧团演员、学员	(130)
五音戏传统剧目	惠忠辑录 (131)
根据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改编、创作的戏曲剧目	(133)
八仙戏简介	李 淦 (134)
淄博市豫剧团简史	集体讨论 李艾田执笔 (137)
淄博市文工团简史	集体讨论 薛仲元执笔 (147)
淄博市群众艺术馆史料	赵光生编写 (157)
淄博市博物馆简史	集体讨论 贾振国执笔 (168)
淄博市魔术曲艺团简史	李忠俊 (176)
临淄县干部业余剧团记略	王 干 (178)
淄博市工艺戏具实验厂简史	集体讨论 陈德亮执笔 (182)
淄博市电影机械修配厂厂史	徐承瑞 (190)

群 众 文 化

周村灯节史话	王川昆 (200)
周村芯子的今昔	王川昆 (203)
周村铜响乐 声名扬四海	朱可海 王川昆 (205)
博山民间表演艺术初探	赵韵清 闫水村 (207)
博山锣鼓	闫水村 赵韵清 (213)
民乐奇葩绽殷阳	王川昆 (217)
商家大鼓乐队漫述	王川昆 (222)

※ ※ ※ ※

关于做好汇集资料工作的意见	(226)
本卷撰稿作者通讯处	(228)
照片专页	(228)
小 启	(230)

淄博市文化志领导小组及编纂工作人员名单

领导小组

刘文杰 宋文范 姬长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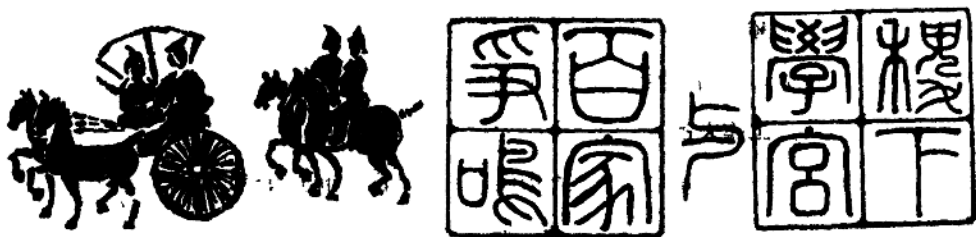
工作人员

崔章蔚	李庆洪	(淄博市出版局)
谭 连	张广哲	(淄博日报社)
耿衍水	郭兰香	曹传禄 (淄博市广播局)
罗光州		(淄博市文联)
韩玉凤	信惠忠	王川昆 董文林
徐先法	孙海军	(淄博市文化局)

文化志——文化局编纂组顾问 名 单

王建新	李玉恒	姜如希
牟仁均	张云铸	朱文裕
滕义勇	张鑫成	李文章
洪俊祥	杨淑苹	赵云生
鲁 童	邓洪山	明洪钧
赵梅村	李忠俊	汪焕荣

古代文化



张福信

战国时期，齐国在都城临淄开设了稷下学宫，聚集了许许多多著名学者，展开了百家争鸣，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建立和昌盛的缘由

稷下学宫在齐国故都临淄之所以建立和昌盛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经济、政治、思想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雄厚的经济基础。齐国原来是一块“地洧卤”不宜种植的地方，人们过着畜牧或渔猎时代的生活。姜尚封齐时，因地制宜，“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汉书·地理志》），开始有了手工业和鱼盐之利。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创）用之。”废除了井田制，积极发展工商业，“通齐国之鱼盐于东海，使关市讥而不征。”（《国语·齐语》）同时，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工具逐步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因而桓公时期齐国的经济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而稷下之学的雏型正是此时应运而生的。

田氏代姜之后，仍然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齐威王听从稷下先生的劝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烹了贪赃行贿的阿大夫，奖励了勤于政务、严于管理的即墨大夫，致使齐国“大治”。而稷下先生们也关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他们鼓吹土地私有，强调农业要增产，必须深耕土地，多施粪肥。到了齐宣王时期，齐国经济终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战国策·齐策》引苏秦的话说：“齐地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这里虽不免有夸张之词，但齐国的富强，临淄的繁华，是客观存在的。

当时，齐国的交通也是四通八达的。不仅有从济南、临淄直达荣成的横贯齐国的东西大道，而且有临淄西经平陵，南出古阳关，而达兖州的要道；有临淄东经即墨而达诸城、日照与吴越交往的大道；有临淄经济南、平原达赵、卫的交通要道；还有从临淄南

出穆陵关而达沂南与楚相接的交通要道等等，为数以千计的学者来往创造了便利条件。

二、政治的迫切需要。田氏政权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的，是非常不易的。公元前762年，陈国厉公之子陈完因内乱逃往齐国，充任工正之职。齐景公当立时，齐国发生内乱，陈、鲍家族打败了栾、高家族，且侵吞了他们的家产。陈无宇将所得财物上献景公，下赠诸位公子，并以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借贷贫民，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拥护。后来，田常充任相国，对内对外采取松动、和缓的政策。到他的儿子田和时，终于把齐康公流放海上，进而取代为诸侯王。从陈完逃齐，到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同意田和的请求为诸侯王，经历了286年的漫漫岁月。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统治地位，田齐政权伊始，就很注重文人学士的作用。徐干《中论》云：“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田齐桓公尊宠贤人是要他们制造舆论，宣扬田氏代姜的合法性。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篇》），是非常适合田氏统治者的口味的。同时，田氏统治者还要利用学士们的活动，铲除滋生新的篡权者的思想土壤。

齐威王继位后，雄心勃勃，不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要称王天下。他铸鼎声称：“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迹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民国九年纂修的《临淄县志》）。这里，齐威王把自己封为黄帝的后裔，不仅承继齐国王侯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还要承继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进而向统一中国的目标前进。为此，他一方面重用孙臆、田忌于公元前353年和341年进行了桂陵、马陵之战，打出了国威，取代魏而称霸东方，一方面广招人才，为他统一中原奠定基础。他在与魏王论国宝时表白说：“我与您对国宝的看法不同，我看中的是人才而不是珠宝。”齐威王看重的人才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够出谋划策的稷下先生。齐宣王承继了齐威王的事业，随着齐国的日益强盛，他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的雄心也愈来愈大。当西方的秦国实行改革，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也不甘心落后，借燕国发生内乱，发兵干涉，只用了五十来天的时间就直达燕国国都，扩大了齐国的疆域和影响。然而，要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长期做下去。因此，齐宣王更加注意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喜文学游说之士”，说“寡人忧国爱民，因愿得士以治之”（《战国策·齐策》），不惜耗费资材，招揽各派学者“数百千人”于稷下学宫。稷下学由此进入了昌盛发展的时期。

三、良好的思想传统。西周之初，封师尚父姜尚于齐，封周公旦于鲁，齐鲁毗邻，但其思想体系一开始就有所不同。齐基本上沿用了当地的习俗，鲁则把西周的习俗几乎全盘搬到了鲁国。伯禽至鲁三年，才报政周公。周公问：“何迟也？”他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而太公封齐，五月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姜尚是有见地的。他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措施，并没有把西周王朝的那一套礼仪教条主义地搬到齐国。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这种因地制宜，从当时当地实际出发的思想，在齐国得到发扬光大。管仲曾说，“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由此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

因循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正确主张。春秋时代的“俗”是正在变革中的俗，是顺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萌芽成长趋势的。尔后，当信奉周礼的孔子向齐景公提出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时，就遭到相国晏婴的强烈反对。他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可见，齐国的传统思想是比较解放的，政治气氛是比较活跃的，学术活动是为变化着的时局服务的。

就田齐本身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通于世变思想的广泛传播，是难以取姜氏而代之的。燕王哙曾禅让相国之子而居王位，由于思想基础薄弱，不仅引起举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而且招致齐军大举入侵，燕国民众又立太子平为昭王，恢复了固有的统治地位。七国之中，唯独田氏篡权而稳定自己的统治，不能不说与齐国的传统思想适于世变是有密切关系的。稷下学士们培育和发扬了这种学风，以至盛行于两汉时期。汉高祖时齐人学士叔孙通要帮助汉高祖制定一套朝仪，以安定朝廷秩序。他曾动员两名鲁国的儒生参与，但鲁生却以“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公所为不合古”而斥责叔孙通，而叔孙通却嘲笑鲁生“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正是由于稷下之学这种近乎趋时，喜于新意的思想作风的影响下，致使归属于儒家的荀卿，也不纯其为儒家，而是吸取了百家的精华，显得非常庞杂。他甚至把儒家学派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斥为俗儒，对子思、孟轲也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

只有在这样一种风气下，才允许各学派各抒己见，展开争鸣，这就是别于他国，周秦诸子独在齐国形成盛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通宜的方针政策。首先，对稷下学士齐国政府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田齐桓公开设稷下学宫时，就把贤者尊宠为大夫之号。而稷下学宫兴盛时的齐宣王更是“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世家》）。对稷下之学比较出类拔萃的人物不仅给予相当于上大夫之职的崇高荣誉，而且鼓励学士们评论国事，提出建议，把他们视为治理国家的“智囊团”。

其次，生活上给学士们以优越的条件。齐国政府给稷下学士们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荀列传》）。郭沫若说：“这些学者们得到了这种温暖的保护，也真好象在春雨中的蘑菇一样，尽量地簇生了起来。”他们“既无事务工作拖累，用不着坐办公厅，有好房子住，不愁穿，不愁吃，还有很多人服侍，这还不好让脑细胞的活动充分向形而上学的方面发展吗？养者与受养者两得其所，于是乎道家思想也就蓬蓬勃勃地兴盛起来了”（《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第三，对各家学派来者不拒，允许“士无定居”。齐国政府对各派学士都是欢迎的，就其学派来讲，可以说稷下之学五花八门，济济一堂。田骈、慎到、接子、宋钲、尹文是道家，孟轲、荀卿是儒家，邹衍、邹奭是阴阳家，鲁仲连、淳于髡“其学无所主”，实际上是博学家；首先提出“白马非马”“服齐稷下之辩者”著称的儿说和田巴是名家，等等。就说道家吧，也分化为宋钲、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环渊为一派。

由于诸侯林立，学者们为了推行学说到处游说，到处奔波，齐政府非常适应这种形

势，采取了来去自由的政策。比如，孟轲到齐国去，宣扬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与淳于髡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看到自己的学说不能在齐实施，索性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为道不为富，坚持要走，齐宣王挽留无效，最后以礼相送。淳于髡、宋钘、尹文、鲁仲连、邹衍等到各国游说，推行自己的主张。荀子也曾到秦国去考察，在《疆国篇》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相比而言，秦国的军制也比齐国的好。众所周知，到了后来，荀子就到楚国兰陵去了。

第四，在学术上实行取长补短，百家争鸣，不治而论的方针。为了明确是非，相得益彰，齐政府和稷下之学在学术上采取了百家争鸣、各显所长、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众多学士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著书立说，“以干世主”。稷下的学士们在争辩中，也注意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辩论，达到弄清是非的目的。荀卿提出“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田骈、邹衍、邹奭、淳于髡、田巴、鲁仲连等都是雄辩家。孟轲曾慨叹道：“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卿更是对老子、庄子、申子、环渊、慎到、季真、魏牟、惠施、邓析、宋钘、墨翟、陈仲、史猷、吴起、商鞅等学宫内外学者一一进行了批判。在辩论中，学士们注意互相学习，努力做到“兼听齐明”“兼论公察”，而不要“唇枪舌剑”。荀子说：“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这种良好的风气，使稷下学宫成了繁荣文化思想的自由讲坛。

稷下之学得以在齐国昌盛是有其多方面的因素的，是较之其他六国有着优越条件的。秦国虽然最后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但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化比较落后，思想比较保守，只是到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之后，才逐渐成为大国，强盛的历史较晚，难以形成文化的中心。楚国国土最大，人口最多，经过长时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了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楚国文化，出现了屈原、宋玉等著名诗人，但由于秦、楚接壤，战争频繁，又缺乏相应的机构设置，学者难以云集。燕国比较弱小，常被山戎所掠，只是到燕昭王时招募贤士，得乐毅，出兵破齐，才有所强大。韩国屡迁京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文化比较落后。赵国与匈奴为界，与齐濒临，局势动荡。这些国家均不具备在战国混战期间，形成文化中心的客观条件。魏国曾一度强盛，公元前424年魏文侯即位，他曾学儒术，著书六篇，尊敬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门豹、李悝、乐羊及大军事家吴起，在诸侯中最有声望。但是经过桂陵、马陵之战以后，魏国向齐国屈膝，一蹶不振。这就是说，稷下学宫在齐国建立至昌盛，是有着独特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它从兴盛到祀废，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84年燕昭王命乐毅破齐，临淄失守，大片土地为燕所占，稷下之学也就不能复存了，百家争鸣的热烈场面由于战乱而破灭了，齐国也随之败落下来，丧失了足以与秦相抗而争雄的地位。

主要学者与学派争辩

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司马迁的记述，点出了几个主要的学者。

淳于髡是“齐之赘婿也”。（《史记·滑稽列传》）。齐王曾“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刘向《说苑·尊贤》）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86年，卒于公元前310年，与孟子、孙臧同时或稍长些。淳于髡曾以讽谏威王而广传后世。齐威王初立时，国势危机，但“左右莫敢谏”。淳于髡却巧妙地迫使威王下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决心，“于是乃朝诸县令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从此，“盛行三十六年”（《史记·滑稽列传》）。齐振兴后，他又以饮酒为喻，告诫威王居安思危。他还多次作为齐国的特使周旋于诸侯之间，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比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齐威王时，“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救兵”。他说服齐王以厚礼馈赠赵国，结果“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另一次是“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可是刚出城门鹄就飞了，但他“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凭他一番别具一格的解释，使楚王感到他忠诚可爱，羡慕“齐王有信士若此哉！”不仅不以失鹄而恼怒，反而“厚赐之，财倍鹄在也”。同时，淳于髡还率领弟子以“微言”进说相国邹忌，敦促他大胆进行政治改革；多次调解君臣矛盾，维护了国家的团结。淳于髡以辩士而著称。他曾以锋利的语言和辩证的方法，使孟子节节败退。他们之间最激烈的辩论有两次。一是淳于髡针对“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质问孟子：假如嫂嫂掉在水里，要不要用手去拉他？孟子用常规与权变的关系作了回答。淳于髡接着问他：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到水里了，你不去援救，又是什么缘故？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孟子言行不一的空谈。二是针对的儒家“仁”，淳于髡指责孟子：你作为齐国的三卿之一，可是并没有建立上辅君王、下济臣民的功业，“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象鲁缪公那样重用儒家，结果鲁国削弱得更厉害了，这种“为其事而无其功”，丝毫“无益于国”的儒家，能算是“贤者”吗？孟子只好用“君子所为，此人固不识也”来搪塞了事。他的思想具有无神论倾向和自发的辩证法，闪烁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光辉。

邹衍、邹奭是稷下学宫中的阴阳五行家。邹衍曾游历齐、梁、赵、燕等国，名噪一时。“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汉书·艺文志序》）。这就是说，阴阳五行的产生是以掌管天文历法为依据的，因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但经过子思、孟轲这些“拘者”的改造，阴阳五行说逐渐失去了原来的面目，“舍人事而任鬼神”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是以探求自然现象开始，而以阴阳迷信结束的。

《史记·孟荀列传》云：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这是邹衍理论提出的缘由和经过。他既要“验之小物”，又要实地考察，他那“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荀列传》）的理论，是在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然他对世界地理画图的勾画是相当粗糙而不真实的，但却把中国置于世界的博大范围之内，是“天下乃至八十一分店其一分”，这不能不说他的视野是相当宽阔的，比起那种“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

(《盐铁论·论邹》)的腐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邹衍到梁国去，梁惠王亲迎郊外，隆重地接待他，尊为贵宾。邹衍到赵国去，平原君不敢正坐，行宾主之礼。邹衍到燕国，燕昭王把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唯恐尘埃沾污了他的衣服，以示崇敬，并且修筑碣石宫，请邹衍给列位弟子讲授知识。邹衍即在此讲授了他的著作之一的《主运篇》。司马迁把邹衍到处受到的礼遇与孔子到处受到的冷落进行了鲜明地对比后说：“邹衍其言虽不轨，佞亦有牛鼎之意乎？”

而邹奭，用司马迁的话说：“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

(《孟荀列传》)

宋钘是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并言于黄老之术，被后人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颇有影响。他可能与孟子同时代，而年龄稍长一些，孟子尊称他为先生，而自己称“轲”。宋钘的主要活动恐怕是与孟子、墨子、庄子等诸子一样，招收学生，讲授学业，著书立说，到处宣传。《荀子·正论篇》说：宋钘“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说，成文典。”

“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庄子·天下篇》说他“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因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宋钘为宣传自己的学说，身行言教，“强聒而不舍”，“见厌而强见”，很有一点拼搏精神。

宋钘的思想，当属黄老之道。《庄子·天下篇》曾叙述过他的认识方面的见解，说：“接万物以别有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骊合驪，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意思是说，人要接触万物，认识其本来面目，必须去掉主观成见；只有去掉主观成见，才能容受各种事物，这是心的认识活动。这就说明，宋钘在认识论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色彩。

尹文是与宋钘作为一派的道家人物，尹文年龄可能比宋钘稍小一些。他们均主张摒去主观成见，而采取纯粹的客观态度。《吕氏·先识览·正名篇》叙述了他与湣王关于“正名”之义的议论。其文云：“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是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形名不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悦）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另外，《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尹文与齐王论士的故事。尹文以善辩之术，把齐王说得无言以对。

慎到是稷下学宫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5年，卒于公元前315年，其学术思想归属于早期道家学派。根据《史记·孟荀列传》的记载：“慎到，赵人”。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大约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进行的。

慎到虽然“学黄老道德之术”，然而他的道家思想却别于宋钘、尹文派和环渊、老聃派。他既不象宋钘那样“以禁政寝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的不切实际的“救世之说”，也不象环、老学派那样的“然独与神明居”的独善其身之教，脱离现实的主张，而是主张不要脱离现实，不要脱离社会，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他认为“齐万物以为首”，主张“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

与之俱往”（《庄子·天下篇》）。慎到的学说，主要内容一是“齐万物以为首”，认为“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它可以的方面和不可以的方面，“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庄子·天下篇》）。二是“弃知去己”。既然“齐万物以为首”，效法于道，那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知识，也不必有自己的看法。他要人们“夫块不失道”，就是说要象无知无觉的土块一样，就不失于道。当时就有人讥笑慎到的“道”，是死人之理。三是“尚法而无法”。荀子说慎子“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认为慎到把法度、法律条文看成是道，那道就陷于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了。这与荀子所讲的法归宿于礼是不一致的。四是“有后而无先”。这就是说，只看到后面，而没有看到前面。这里所说的先后，大概是指的道。道的先后，是指“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而言的。荀子一贯对先王与后王之道是并重的，而比较侧重于“法后王”。因而荀子对慎到的思想是不赞成的。五是主张定分。《吕氏春秋·慎势》引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欲）也，由（分）未定（也）。由（分）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一兔走的故事虽多出，慎到的定分论，从政治态度上讲是赞同私有制的。

慎到的“势治”思想，对韩非建立法家学说影响很大，韩非子进一步阐明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道理，进而发展了慎到的思想，建立了系统的法家思想体系。

《庄子·天下篇》把慎到与田骈相提并论，作为道家的一派。《吕览·执一篇》载“田骈以道术说齐王”，自称其言“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拘而莫不当”。这也是他学说的高度概括。《尹子·广译篇》说：“田子贵均”，“均”之义，也就是“齐”的意思。可见，他们的学术理论是比较一致的。田骈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定的章法、规律，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处理事情，这样就会无不恰当。田骈强调“因”、“任”，《管子·心术》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虽然是宋钘的思想，可作为田骈“因”字的注脚，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是比较突出的。这种纯客观的自然主义倾向，是与孟子儒家学派的“尽心知性知天”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以客观事物为前提的。这反映了道家与儒家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

环渊是稷下学宫中知名的先生之一。《史记·孟荀列传》云：“环渊，楚人”。他在齐的活动大概是在齐宣王的末年和齐湣王时期。环渊的名子见史书者叫法不一，诸如范娟、范环、娟娟、娟娟、便娟、玄渊等等。郭沫若认为，“关尹即是环渊，关尹、尹渊均一声之转。”（《青铜时代·老聃、关尹、环渊》）恐怕不足为信。环渊是道家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司马迁说：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他在学术思想上，对其先师老子的学说有所修正和发展。他不讲老子的那一套绝对无为，而是有所为；也不象老子那样“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而是分析其利害、得失，趋利避害，计得防失，充满了法家的味道。环渊的黄老道德之术是学用并重的，并形成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环渊曾用自己的笔润色过先师的遗言——《老子》书，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环渊的思想与其先师老子的思想已有很大不同。老

子是春秋末期人，他的著作《老子》，主要思想也是老子的，其基本内容是春秋末年之社会存在的反映。而环渊是战国中后期黄老学派的一支，这时的黄老学派是以道、法互融为其特点的，就是用道家的哲学思想去论证法家的政治学说，从而更好地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由此可见，《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篇，比起《道德经》来，更符合环渊的思想。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后来，公孙龙鼓吹此说，而名扬天下，至今还对此说评价不尽一致。儿说的主要活动大约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也是稷下学宫兴盛之时。他的“白马非马”的论题，是将“白马”分解为二，即白与马，“马”主要指的形状，“白马”着重指的是颜色，形状与颜色两不相干，“马”与“白马”就有差别，故曰“白马非马”。约与公孙龙同时的墨家对此有一段不点名的批评：“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驷马，马也；乘驷马，乘马也”（《墨子·小取》）。荀子和韩非子则先后从“惑于用名以乱实”和“考实按名”对儿说一派以“白马非马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作出了一针见血的正确评价。郭沫若认为儿说即貌辩。貌辩执事《战国策·齐策》与《吕氏春秋·知士篇》都有记载。说的是，靖郭君与齐宣王关系不好，而貌辩却凭三寸不烂之舌把宣王说得由怒到喜，由把靖郭君杀死之意到请为相之。这说明了儿说确实是一位辩才。

告子是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主张“仁内义外”和“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郭沫若认为，他是属于黄老学派的。《孟子》书中有告子与孟子辩难之辞，其中有“生之谓性”和“仁内义外”两则。两次辩论告子都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从记录上看告子都以辞穷而告终，被辩败了。但是，这份记录是由孟子或其弟子写成的，可惜另一方的记载早已失传了。

孟轲是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对于他的学说不述，只叙与稷下学有关的经历。应该说，孟子是与稷下学最早发生联系的一批先生之一。据徐干《中论·亡国篇》云：“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孟子第一次游齐的时间，据孙开太同志的考证是在他四十多岁，齐威王执政的时期。他这时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听说齐威王招贤，就来到临淄，成为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由于稷下主要是尊尚黄老之术的，因而儒家思想得不到重视。但是，孟子在百家争鸣中自不甘落后，也奋力争辩。因而，才出现了前面所说的与淳于髡关于“男女授受不亲”和“仁”的两次辩论，结果是失败了。可以想象，善辩的孟子在争鸣中分享胜利也是有的。由于种种的原因，在稷下学宫没有得到显赫的地位，但也未有受排挤之嫌。据《孟子·公孙丑下》载，齐威王似乎还想重用他，曾“馈兼金一百”，表示对其特殊优惠，孟子却以“未有不处”而不肯接受。孟子在齐呆的时间并不短，后来的地位也比较高了，得到了客卿的待遇。孟母死后，孟子丧母用卿之礼而丧，这就是齐国给予他的荣誉。孟子返鲁葬母，是他第一次游齐的结束。这大约在公元前327—324年。根据孙开太《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一文说：孟子在游历了宋、薛、滕、魏之后，再次来到稷下学宫，此时齐国当政的是齐宣王。很可能，齐威王后期的稷下学宫是比较冷落的但到了宣王时稷下学宫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兴旺的景象。公元前320年齐宣王继位，继位后的第二年

孟子就在说梁襄王后由大梁（今开封）到临淄。《孟子·尽上篇》云：“孟子自范之齐”。范，是今河南范县东南20里，为从大梁到齐的要道。《孟子·告子下》又说：孟子“由平陆之齐”。平陆也是由梁到临淄的必经之路。据阎若璩《释地续》说：“平陆为汶上县”，是齐国的边邑。孟子这次到稷下之前，名声就很大了，到稷下后受到了齐宣王的尊敬，也阔气得多了，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齐宣王曾经多次召见他，一起讨论政事。宣王曾向孟子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想寻求称霸诸侯之道，然而孟子却大谈“仁政”，论君臣关系，论“尚贤”，论“与民同乐”等等，而且言辞锋利，有时弄得齐宣王无言以对，以致“王顾左右而言他”。对于儒家的思想，齐宣王并不赏识，更不采纳，当齐宣王派兵伐燕时，可能孟子竭力反对，然而一心想称霸的宣王是不肯听从孟子说教的，孟子也只好离齐，过宋归邹。据孙开太考证，孟子在稷下的时间大约经历了三十年。

荀卿，赵国人，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230年。《史记·孟荀列传》：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郭沫若认为，荀子应是十五岁游学齐国，是在齐宣王末年。《风俗通·穷通篇》说：“齐威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孙卿即是荀子。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集了百家的大成。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中说：“荀子的文章颇为宏富，他要算是最有幸运的人，他的著述保存下来的一共三十二篇。……他以思想家而兼长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传是他的弟子的韩非，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台柱了。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荀子的思想是博杂的。他是主张人定胜天的。他认为，“天地之变，阴阳之化”，一切天变地异，自然界的反常现象，是可怪而不畏的东西。对于人性论的探讨上，他是主张人性恶的。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在他看来，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一样的都是“小人”，只有靠后天的努力，日积月累，才能分化。因而，他专门写了《劝学篇》，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对社会理论，他是注重群体的作用的。他认为，“能群是人类所以能够克服自然界而维持其生存的主要本领；群之所以能够维持是靠有所分工；而分工的依据就是礼义。他在《礼论》中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而不乱，弑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他把宇宙的变化，运用到了人类社会。荀子是稷下之学中最老的一位导师，他曾经三次充任稷下学宫的最高领导。只是到了晚年，“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远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荀列传》）。

鲁仲连，齐人，是稷下学宫末期的重要人物。《史记·鲁仲连传》云：鲁仲连“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唐代诗人李白为他的却秦救赵的事迹所感动，写下了《古风》一首歌颂了鲁仲连倜傥豪迈的气概和功成不居的思想，其诗云：“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以澹荡人，拂衣可同调。”鲁仲连的事迹很多，他善辩，善于外交。田单由即墨反攻打败燕军，独攻聊城岁余不下，士卒多死，而鲁仲连只写书信一封，射于